

西门口的香辣甜咸

查理森

50多年前的西门口，基本上承包了故乡安徽省泾县城内数万人家日常生活的所有滋味、波澜不惊地酿造着岁月的酸甜苦辣——这么说，是因为在西门口的南北两条老街街口上，分布有糕饼坊和酱坊这两家作坊，各司其职地生产着供全城百姓生活所需的甜蜜和咸辣。而在糕饼坊里，又有一家黄烟店，据说它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末民初。在抵制烟卷普及之前，这个不大的黄烟店便是全城烟民的圣地，金黄油腻的烟丝日复一日地兴奋着他们的神经，也在不经意间，给西门口弥漫的甜咸滋味中混合了一丝特殊的苦辣，让岁月的气息更加丰富多彩。

糕饼坊的全称是“公私合营商店糕饼坊”，属于当年社会主义手工业改造的产物，将原先零散的几家私营糕饼店统筹起来并注入国有资本，构成了公私资本合营的商业形态，提升了生产能力，丰富了产品结构。商店及作坊的日常生产经营则延续了前店后厂的传统模式。临大街是销售门面，一溜长约十多米的柜台，从中间划分为两部分，西边主营糕点等食品，东边则是小百货如布匹洗涤用品等。后院就是仓库和糕饼生产车间了。店面营业员加糕点师傅共有30多人。

糕饼坊东侧毗邻并共用一个后院的即是县蔬菜公司酱制品厂(酱坊)。那时候物资匮乏，寻常百姓家过日子粗茶淡饭，咸菜是每餐都不可缺少的开胃下饭伴侣，酱坊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产业部门。不仅是酱油、酱菜等酱制品，豆腐、豆干等豆制品也用它来生产加工，比起糕饼坊，酱坊的生产任务更重、经营产品更多，地盘相应也就更大，形成了一厂三坊的格局。以西门口为中心，东侧的这算是它的总部兼做大路货的酱菜，北侧临街口是一亩豆腐坊，再沿北街往北走进30米左右，有个专门用来晒豆瓣酱、腌泡酱瓜和酱萝卜的大院子，一口边长五六米、深约两米的正方形大水泥池子以及几十口深褐色的土陶大缸便是主要的生产设备。盛夏时节，缸里正在发酵的豆酱，酱池里东倒西歪、层层叠叠挤作一团的各种瓜菜，在

往事

俞俭

17岁的我，还是个懵懵懂懂、莽莽撞撞的野少年。上世纪70年代，我的家乡初高中学制均为两年。我15岁高中毕业正赶上恢复高考，上了体检分数线，家里向亲朋好友借钱置办新衣新被，做好上大学的准备，哪知录取分数线提高20分，竟以1.5分之差而无缘大学。乡教办主任金观希老师把我看成个人才，延请我到前坦小学当民办教师，那些年在乡村要能当个民办老师很不容易，找关系托人情都难以谋到这一职位。前坦小学只有四五两个高年级，也只有两个老师，我教语文、常识、美术、体育，学生和乡亲都称呼我“小老师”。

因为我对学生太严厉，闹得有点不愉快，一个学期后，我就不想干了。金主任还亲自跑到我家来，让我新学期到乡中心小学去授课，似乎有“三顾茅庐”的感觉。但我固执地拒绝了，母亲在一旁嘴巴看着很着急，怎么劝我也不听。从此，就开始了我的少年流浪生活。

母亲对我的意气用事忧心忡忡，不只是因为家境贫困需要有一份经济来源，更是期望我有一个好前程，依我弱小劳力务农挣工分根本不顶事，一个跳出“农门”的大好机会硬是被我断送了。但我也没想自暴自弃，落成一个废人。少年野心勃勃，异想天开，以为干什么都能成，悄悄谋划着“创收”大计。

我收集了许多民间验方和生活小常识、生活小窍门，又从祖传中医书上抄来一些中药方，到大部队刻钢板油印出来，装订成小册页，然后邀了外村一个小伙伴，走村串户去兜售。从春天到夏天，游走十村八乡，每到一处都引来不少乡亲围观，但几乎没有人愿意买，而且被当作笑话，还有说我们是骗子的。两三个月下来，大概卖出十多份，多是出于好奇或好奇、好玩而买去看看。不过，一路乡亲都纯厚亲切，大方好客，给水喝给饭吃。后来小伙伴和我两人总结说，“混了几餐饭，看了几个山村美少女”。

火辣的太阳炙烤下散发出咸香的气息，日子的烟火味便浓烈得化不开了。

因为父母都是糕点坊的职工，所以我对它更为熟悉。虽然我们的家在北街，但父亲经常要在店里值班，母亲也忙于糕点的原料加工，所以上小学前的那几年我就随他们住在店里，耳濡目染的都是糖、油、面之类的原料和各种糕点。而借居的那间小屋又紧挨着加工黄烟的车间，无意中又让我对烟有了过早的接触。

印象中黄烟加工那活儿可不轻松。要把一张张干燥金黄的烟叶一层层码放到一台又高又重的木制榨床上，每一层都要喷洒一遍清水，通过榨床的巨大压力，榨出烟叶中的部分焦油，使原先单张的烟叶牢牢地粘合成一个整体，再一捆捆地放到特制的刨床上，制烟师傅们骑坐在一端，双手一左一右紧握着一把锋利的刨刀，一遍遍地修整捆的烟叶削成金灿灿的烟丝(那架式类似手切涮羊肉片)，行业俗称这个过程为“推黄烟”。一缕缕金黄油亮的烟丝悠悠地飘落到刨床下的大箩箩里，慢慢地就堆积成尖顶的小山，烟草的奇异香味便充斥了整个车间。

“推黄烟”很费体力，一上午的工作中，师傅们往往要休息几次。他们随手从箩箩里捻起一小把烟丝，塞进自备的烟袋窝里，点燃了吸上一口，稍许再缓缓地吐出烟雾，那种神情是绝对的享受。我好奇地把玩过他们的吸烟工具，俗称“烟袋”。传统的烟袋有两种，最为高级的当是用黄铜甚至白银制作的“水烟袋”。只是这玩意儿在当时被视为地主老财的奢侈品，只能在电影里看到，现实中已没有人使用了。而另一种较为普通和实用的则是“竹烟袋”。一般是用手指粗的毛竹根及根部以上约一尺长的这一截，把根须清理干净后，削成一颗带尖角的椭圆形，先用铁钻或烧红的铁条居中烫出一个小圆孔，再从另一端插进竹管里，疏通竹节，与圆孔贯通后，基本上可以用来抽烟了。讲究并有财力的人则会在烟管上镶嵌一小截玉或铜的烟嘴，在烟窝上镶一片黄铜，时间久了，烟管被磨蹭得油光发亮，犹如一件包浆厚实的文玩艺术品。

那时还见不到一次性打火机，烟民们多是把当地产的土黄色草纸(又称“裱芯纸”，主要以

不动声色

稻草为原料，质地柔软，燃熔值较高，不易灭)。裁成寸把宽、尺把长的小条，再搓卷成一根根竹篾似的细长款备用，我们那儿把这叫做“纸媒子”，顾名思义即是引火的媒介。需要吸烟了，便用火柴点着这媒子，再轻揉几下把火苗晃灭，留着一星余火慢慢地燃烧。点烟时用嘴对着火星轻轻一吹，就会腾起一朵温暖的火苗。“吹媒子”是有技巧的，不能太用力，也不能像吹风一般，大体上用舌头从上下牙缝中急速顶出一口气(风)才能吹起火苗。我等一干孩童，那时就喜欢甚至争抢着给大人吹火点烟，为的就是享受火苗腾起那一瞬间的快乐。

糕饼坊的生产一年四季基本平稳，只有在端午、中秋、春节几个大的节日前才会火力全开、加班加点。糕饼坊的主打产品有方片糕、酥糖、绿豆糕、麻饼、香蕉酥等等，而方片糕又因为嵌有彩色果脯码成的“卍”字图形而被称作万字糕。另一种加有黑白芝麻和果仁的又叫“麻烘糕”。在那个年代，一条方片糕承载了老百姓无数的寄托，浸润着浓厚的吉祥如意色彩。逢年过节送条糕，家有喜事送条糕，传达出的都是祈祷事业学业步步高升、祝福日子家庭甜蜜幸福的良好心愿。而香蕉酥的由来，则缘于家乡一带很少能见到真正的热带水果香蕉，便用油、面、糖混合做成弯弯的像是香蕉模样的点心，以“香蕉酥”称之。而添加在其中的香精也真的让它有了点儿香蕉的味道。

糕饼再丰盛也只是“点心”，当不了一日三餐，对老百姓过日子来说，油盐酱醋更为重要，于是酱坊的生产和生意也就更热闹了。腌菜、晒酱、做豆腐，是酱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工作，长盛不衰。

世人都说“四川人辣不怕、湖南人不怕辣”，其实江南如我家乡一带，也都嗜辣如命，一款款香辣可口的菜品不知发明于哪朝哪代，穿越岁月的风雨，至今仍为乡亲们盘中美食。而那一份香辣脆爽的腌泡辣椒片，更是一代代代人无法割舍的乡愁、乡恋，附着上了浓浓的乡情。彼时街坊邻里少量的“自力更生”

那个山村野少年

小工都是计件工，按每天挖多少茶行计酬，管理人员统一验收记账。已记不清一天能挖几行茶地，挖一行茶地是一毛钱还是两毛钱，按茶行长短论计，一个月大概能拿到手20多元。堂哥是高度近视，有时杂草除不干净，管理人员让他返过几次工，后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情他挣点工钱不容易。茶园施肥和修剪，都有技术员负责操作，不放心让小工做。

茶园秋挖并不是最苦最累的活。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正在开一片新茶园，让小工从一处小山挖了熟土挑到刚平整出来的一块新园，以待开春扦插茶苗。一担大簸箕装满土，大约150斤，重时高达180斤，因为计重付酬，100斤5分钱吧，我们都尽可能装得满满的，300多米距离，中途会歇一肩，管理人员指导挑至哪儿再给称重。开始第一天，劲头十足，脚下生风，挑着满满一担土，呼噜呼噜往前冲。可是两三天下来，肩膀磨得红肿破皮，到校卫生室弄来紫药水、磺胺水和纱布棉球，互相擦药。虽已初冬，天气凉了，但每天都是大汗淋漓，汗水流进眼睛刺痛，流进嘴巴成咸的，顾不上擦一擦。一个星期后，就感觉挑不动了，两腿走路都打颤，踉踉跄跄往前走，耸肩弓背，咬牙紧，拖着脚，继续挑一担，再挑一担。最恼人的是，管理人员指着某处说，再往前一点，再往前一点，而担子沉沉压弯腰、头抵地，感觉半米远都快熬不住了。

我常给人说，自己个子矮小，左右肩高低不一样，都是那时挑土压垮的，本来正该长身体的时候，却被压得长不高了。今天跟年轻一辈谈起这段经历，都几乎难以相信。前一位亲戚挑了半个多月土，因为家里有事提前回家，就没有再来做小工了，我和堂哥一直干到腊月初头才回家。

下雨天就不开工，可以好好休息，可是一连几天秋雨绵绵，又想着要干活，有时管理人员找一些室内杂活让我们做。后来发现有一

个的好去处就是校图书馆，不干活时就来这里看书。我就是这时喜欢上了高尔基。中学时读过《海燕》，印象很深，常常喜欢背诵：“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读高尔基的作品，就感觉他脑海里像有一股股山泉接连不断喷涌出来，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人物蹦出来，感觉他的语言像刀一样锐利，很有力量，就像挑土时扁担勒进我稚嫩的肩膀。特别是看了《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想想自己的经历，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高尔基。其实，我远远比不上他经受的苦难磨炼，比不上他经历的丰富广阔。第二年上师范后，就借来新出版的《高尔基文集》阅读了一遍。

做小工期间有幸认识了几位老师，至今珍藏着一本厚厚的红封皮《江西草药》，就是一位施老师赠送给我的，扉页写着“祝多才多艺，多立新功”，日期是1980年12月10日。人生路上许多人相遇相识都是缘分，施老师是茶叶科研专家，我和他不知怎么就熟识了，似乎还谈得来，至于当时怎么交流早已记不清，唯有一份情谊永远难忘，两人至今还有联系。回想做小工的日子，我并没有感受到劳动的快乐，却也没有感到生活的忧伤，只是一天天平常地过着，坚坚实实地扛着，没有想到要从中收获什么，似乎都是切实必然发生的，就像江水自然地从茶校旁边流过、毒热的太阳落下去第二天还会升起来一样。而实际上，这半年吃的苦，受的累，忍的痛，已深深烙印在我的人生。

来年春天，正是采制清明茶的时候，我来到高砂中学复读准备参加高考，表兄在这里教物理课。复读三个月，考入万年师范学校，告别那个山村野少年，用力向着新的生活狂奔。

正如此

(上接16版)此外，面朝大海的这片蔚蓝色区域，一直是河北最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河北是一个有着487千米海岸线的沿海省份。

河北全省西高东低，正好环抱渤海。千年不倒的镇海吼，秦始皇东巡、徐福东渡、曹操望海抒怀，无不见证着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对于更大世界的想象。

“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河北已经开始规划新的蓝海梦想，这部纪录片所呈现出来的正是对大海的认知。”作为唐山人，“面朝大海”篇导演冬清对海洋的感情更深一些，“纪录片播出之时，正值河北打赢此轮疫情阻击战。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河北将迎来新的春天到来。”

燕赵缘何多“慷慨悲歌之士”

被后世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在一篇名为《送董邵南序》的文章中开篇写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韩愈这句话的意思，用现代话来说，就是自古以来，人们便说燕赵一带多有慷慨悲歌的豪侠之士。

距今一千多年前，韩愈这篇文章里就使用“古称”，这大概是指距今两千多年前，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荆轲吧。

荆轲不是诗人，却留下了这句传诵千古的诗词。与荆轲大致相同时期，还有这样的记载，惜字如金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中山(今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中山国)地薄人众……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

《隋书·地理志》关于各地的风土人情也有这样的记载：“冀州于古，尧之都也……人性多敦厚……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故《班志》述其土风，悲歌慷慨。”

唐代另一位诗人骆宾王也曾留下《易水送别》诗篇：“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描写荆轲刺秦王出发地易水河，易水河主要在易县，这里曾是燕下都。

清代黄遵宪《慷慨》诗云：“慷慨悲歌士，相传燕赵多。我来仍矢志，走向近如何。”

《大河之北》这样描述“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历史传承：时代的车轮不会停止，单凭一己之力无法撼动历史的走向，但壮士的牺牲不是徒劳。当燕国与赵国的往事随着时光远去，“燕”与“赵”合成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代表了这片不屈不挠、坚韧如铁的厚土，燕赵风骨就这样刻入人们的基因里。

“得名河北”篇导演辛七天说，自古英雄辈出的这块土地上，古往今来，唱出了一曲又一曲激昂高亢的悲壮之歌。

进入二十世纪，辛亥革命爆发、新文化运动涌起，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曙光初现的变化。

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的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0年，他开启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伟大壮举。1927年4月28日，年仅38岁的他慷慨赴义。

如今，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大厅里，还摆放着李大钊就义的绞刑架。李大钊生前曾撰有一篇短文《牺牲》：“人生的目的，在发挥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在悲凉的氛围。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今天，李大钊为之付出生命的中国共产党已是世界第一大政党，他为之奋斗的国家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越来越接近。

抗战时期，在荆轲刺秦出发地易县还发生了狼牙山五壮士英勇事迹。五壮士之一葛振林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他和战友们听到杨成武将军讲过古代壮士荆轲的故事，那“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歌，一直回旋在他们的心头。

当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为狼牙山五壮士纪念碑题词写道：“视死如归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

《大河之北》不仅表现了自然地貌，当下社会文化热点等内容，而且充分调动了观众对河北的民族情感与历史记忆，描绘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自然与人文地理长卷。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纪录片委员会会长、中央新影集团副总裁赵捷表示：“感情充沛的旁白解说、壮阔的画面以及现代手法的拍摄，将黄河文明与慷慨悲歌的燕赵志士的胸怀有机结合在一起。”

著名纪录片撰稿人张海龙认为，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战争饥馑的河北，人们习惯了居安思危，总能应对生命中的种种横生枝节，这就是笑看风云变幻的底气与慷慨悲歌的豪情。

对于燕赵缘何多“慷慨悲歌之士”这个庞大的命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你的答案，是什么？

一对来自美国的夫妻，在中国留下一处红色教育基地

(上接13版)与她毕生奋斗在中国的爱人走了，留她独自一人，默默坚守着那份纯粹的共产主义信仰。2004年，作家巍巍等19位老同志写信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建议授予阳早、寒春“白求恩式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称号，保留故居作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基地”。

2010年6月8日，89岁的寒春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她生前再三叮嘱去世后不搞任何悼念活动。后来，她的女儿阳平提议，将父母的骨灰撒到鄂托克前旗三边牧业辽阔的草原上。

2010年6月21日，骨灰撒放仪式在鄂托克前旗城川镇有州古城遗址上进行，孙女吉娜在这片土地上缓缓地奏响阳早、寒春生前最喜爱的《东方红》，这是对阳早、寒春最真挚又最隆重的告别，是对他们最质朴却又最深刻的思念，是对他们一生追求最简洁却又最持久的追忆。

伴着《东方红》乐曲，儿子建平、儿媳考建华、孙女吉娜，把阳早、寒春的骨灰撒向这片土地，让他们魂归一生挚爱的牧场，魂归这片为追

寻革命信仰、最早到到的土地，让他们和挚爱的中国人民在一起。

阳早、寒春是为追求信仰而来的中国。寒春曾经说过：“我来到延安，是一个梦想的开始和另一个信仰的开始。”

在中国的六十多年，他们像白求恩一样，以毫不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当作他们自己的事业，实践了“为信仰而来”的诺言，从稚嫩青年走到耄耋晚年，执着地探寻人生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

如今，在阳早、寒春工作过的鄂托克前旗城川镇，也就是唐朝有州古城向东600米处，当地政府建起了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的阳早寒春红色培训教育基地，其中“阳早寒春三边牧场陈列馆”占地1325平方米，展示了为共产主义信仰而来的美国友人阳早、寒春夫妇的国际主义精神事迹。